

多层次一体化与东南亚地区发展前景

蔡东杰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关键词] 地区主义; 一体化; 东南亚; 次地区; 微地区

[摘要]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世界在 21 世纪初正以多层次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除了有最高层次的国际组织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 外, 还有代表传统国家利益的地区建制 (例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此外便是次地区甚至微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对此, 本文将由分析相关理论架构的发展切入, 然后从次地区、微地区与地区层次, 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分析, 希望能有助于了解这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6-0004-08

Multi-Level Integr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Tsai Tung-Chieh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zhong, China)

Keywords Regionalism; Integration; Southeast Asia; Sub-region; Micro-region

Abstract Obviously, the world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s re-construct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 the multi-level approaches. Excep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the highest level, some regional regime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sovereign state (i.e. EU and NAFT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b-region and micro-region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we'll set an example by studying for Southeast Asia, then try to realize the future of the integration in this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region, micro-region and region.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多层次一体化

当前地区化 (regionalization) 与地区主义 (regionalism) 的发展, 可以从地区内部社会文化层面来考察, 也可从外部政治因素来观察。例如, 坎多里 (Louis Cantori) 与史匹格 (Steven Spiegel) 强调地理邻接性、国际互动与共同特征 (种族、语言文化、历史等) 的重要性^[1]; 多伊彻 (Karl Deutsch) 认为地区是由具有广泛互相依赖性的一群国家所组成^[2]; 罗塞特 (Bruce Russett) 则提出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相似性、政治态度与对外行为近似、政治上透过国际建制存在相互依存现象、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具有地理邻接性等定义标准^[3]。无论如何, 尽管人类对地缘环境的重视相当久远, “地区”这种具有超国家性质概念的出现仍是非常

晚近的。换言之, 相对于长期以来透过国家疆界区隔人群行为的传统, 这种企图重新界定人群活动范围的趋势既具颠覆性, 也凸显出全球化对当前国家体系带来的冲击。

一般所谓“地区主义”是指: “若干单一国家经济体在制度上结合成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4]。但相对于以冷战结构为背景, 以传统五大洲地缘政治概念为凭借的“旧”地区主义, “新”地区主义不但形成于呈现多极化格局的冷战后期, 其一体化途径也凸显功能主义的由下而上的外溢 (spill-over) 特征^[5]。由此, 首先形成经由裂解五大洲而出现的新概念 (如东北亚、拉丁美洲等), 这也是次地区主义 (sub-regionalism) 与次地区经济区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SREZs) 讨论出现的原因^[6]。不过, 随着成长三角 (growth

* [收稿日期] 2009-07-11

[作者简介] 蔡东杰,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所长, 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副院长。

triangle)^[7]、自然经济领域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或是扩张性都会区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等名词的浮现, 所谓“微地区主义” (micro-

regionalism) 的问题也跟着进入讨论范畴。几种地区主义之间的差别可参照表 1。

表 1 地区主义类别及其差异

类型区分	地区主义 (Regionalism)	次地区主义 (Sub-regionalism)	微地区主义 (Micro-regionalism)
地理界定	传统式地缘概念 (如: 五大洲)	裂解式地缘概念 (如: 拉美、中东、东南亚)	次国家地缘概念 (如: 成长三角)
推动主角	大国	中小型国家	地方政府
行动目标	建立贸易架构 推行非歧视性措施	对抗外界 (包括地区主义与全球化) 压力	促进经济成长 落实比较利益分工法则
发展优点	形成有效规模经济	符合中小国家利益	最具政策弹性
发展限制	地理范围过大导致歧异 大国间争霸冲突	地域界定模糊 发展计划缺乏共识	国家体系现实 市场规模有限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进一步说, “演化—制度学派” (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t) 将制度界定为“某种可供观察且被遵守的人类事务安排”, 至于焦点则是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 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透过独特的多层次制度创新来保持国际竞争力。其基本假定是: 经济全球化已大幅降低诸如自然资源禀赋、低廉工资与削价竞争等传统政策的重要性, 至于技术创新与国际分工结构的形成则变得愈来愈关键^[8]。除此之外, 也有人从“多层次治理” (multi-level governance) 角度来进行观察, 亦即从行为者研究途径、新功能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等架构出发, 更重视“次国家”或“超国家”建制角色^[9], 亦希望透过理性抉择角度, 解释何以国家 (或决策者) 会将权力让渡给地区、次地区甚至微地区组织^[10]。

总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由于一体化浪潮随经济发展席卷东亚^[11], 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开放主义”与其他若干新特征。在东亚, 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外, 还出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 (PEC) 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 (EAEG) 等倡议。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次地区与微地区层次的发展。由此, 东亚一体化可分成以下几类: 首先是多边一体化途径 (multilateral integration approach), 亦即由多个国家共同建立合作架构, 例如环日本海经济圈与成长三角区域等; 其次是双边一体化途径 (bilateral integration approach), 亦即由两国边境贸易活动延伸而来的跨国经济区; 然后是国际协调途径 (ir-

temational coordination approach), 亦即透过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中介, 成立诸如图们江计划或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等多边机制。在本文中, 我们将以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为例, 来说明这些变迁趋势。

二 次地区主义层次: 东南亚共同体的努力

首先, 我们将焦点集中在次地区主义的一体化层次。如同表 1 所示, 次地区主义运动是形成新地区概念的主要动力来源, 其与旧地区主义所存在的差异之一, 在于推动者未必或甚至大多都并非强国, 而是中小型国家^[12]。再者, 相对于由大国所推动的地区主义经常意涵着“划地自限”的保护色彩而言, 次地区主义则往往充满“开放”特征, 亦即一体化目的未必在形成集团, 而仅是希望通过深化合作以便共同提升发展程度, 然后藉此增加各国承受全球化或由大国所推动地区主义计划的抵抗力。

东南亚次地区运动起源甚早,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在 1967 年便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其所谓“东盟模式” (ASEAN way) 也广受注意^[13]。相较于其它一体化机制, 东盟模式直到 2007 年通过宪章前, 既缺乏组织章程导引, 也未设置任何超国家协调机制, 对运作规范亦无完整说明, 仅存在以“互相尊重、协商一致”为基础的松散结合; 所谓“一致”并非意味全体同意, 而是只要“没有反对意见”即

可。尽管这种模式确实使东盟发展相当缓慢（参照表 2 所示），但因它可为弱小成员提供尊重与保护，因此也让一体化进程不致功败垂成。进言之，这种运作模式其实也来自东南亚发展的两个现实：首先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差异太大，因此需要一个可取得“差异中的团结”的模式；其次则是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均具有很大的对外开放性，而松散的运作模式较能让各国在面对国际社会时拥有较大的因应弹性。

表 2 东南亚次地区主义发展概况

年份	重要发展
1967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正式成立
1971	东盟发表《和平、自由与中立区 (ZOPFAN) 宣言》
1976	首届东盟峰会，通过《东盟友好同盟宣言》并缔结《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1977	通过《优惠贸易安排协议》(ASEAN-PTA)
1992	东盟峰会通过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构想并于翌年启动进程
1994	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
1995	东盟领袖签署《东南亚无核区公约》(SAENWFZ)
1998	通过《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预计在 2010 年正式成立
2002	吴作栋提出“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构想，“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
2003	东盟决定在 2015 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
2004	东盟决定效法 EU 在 2020 年成立“东南亚共同体”
2007	东盟峰会通过《东盟宪章》，决定在 201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当然，光是松散的“东盟模式”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各国在东盟成立 10 年后的 1977 年通过“优惠贸易安排协议”，规定翌年起在加盟国家间提供优惠关税。尽管优惠贸易项目从 1978 年的 71 种增至 1992 年的 16 458 种，但区域内贸易比例却仅从 15.8% 微升至 18.4%^[14]，显示其贡献相当有限。为因应地区一体化浪潮并强化地区竞争力，东盟也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加速一体化进程；首先在 1991 年提出自贸区计划，接着东盟峰会在 1993 年《新加坡宣言》中也揭橥“东盟自由

贸易区”(AFTA) 构想，同时签署一项《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议》(CEPT Scheme)，希望能加速推动一体化。1997 年，各国通过《东盟 2020 年愿景》并在翌年通过《河内行动计划》将自贸区成立时间表再提前至 2002 年。

为尽早实现自贸区构想，东盟先后在 1995 年通过《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议》(消除服务业限制)、1996 年通过《东盟工业合作计划》(提供合作者优惠关税服务)、1997 年通过《东盟海关协议》(计划并统一海关程序)、1998 年通过《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消除区域内投资限制)、2000 年通过“东盟能源网络”建设构想与《电子东盟框架协议》(提升电子业国际竞争力)，以及 2002 年通过《东盟旅游协议》(共同开发观光市场) 等。根据统计，尽管地区内贸易比重仍然有限，东盟内部贸易在 1993—2001 年间仍增长了 84.5% (由 824 亿美元增至 1521 亿美元)，高于对地区外贸易增长幅度 (同期对地区外贸易由 3475 亿增至 5356 亿美元，幅度为 54.1%)^[15]。以此为基础，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 2002 年峰会上提出建立“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的构想，各国并在翌年通过《第二次巴厘宣言》(the Bali Declaration II)；根据其行动计划，各国将于 2010 年率先实施 11 个领域一体化，同时提出“东盟制造”(Made in ASEAN) 品牌。在 2004 年峰会上，除与中国签署一系列自贸协议外，各国也同意在 2020 年前效法欧洲成立具有共同安全目标的“东南亚共同体”。最后在 2007 年，各国则通过包括《东盟宪章》、《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环境可持续性宣言》、《气候变化宣言》等文件，希望设法拉近成员国发展差距，并加速在 2015 年实现共同体目标。

不过，东南亚的次地区一体化发展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如何通过东盟来建构更安全的战略环境，也是被关注的焦点^[16]。各国除早在 1971 年便通过成立所谓“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域”外，1976 年由马来西亚倡议并推动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994 年成立“东盟地区论坛”则是其主要成就^[17]；该论坛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东盟模式，使原先以不干涉为主的“包容性地区主义”(inclusive regionalism) 朝“干预性地区主义”(intrusive regionalism) 迈进^[18]，从而让东盟成为建构安全社群中“溢出”的成功典范^[19]，同时将“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的概念引进冲突解决途径中。

三 微地区主义层次：地缘经济圈的形成

微地区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次次地区主义”(sub-subregionalism),事实上它与地区或次地区主义都是彼此相关的,因为所谓“新地区主义”本来便有多种一体化形式共存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一体化尽管多源自经济因素,但微地区主义特别强调从经济现实角度来重塑政治空间,也引发“跨边界地区”(cross-border region)等讨论^[20]。

例如,大前研一便将此新互动单位称为“地区国家”(region state),并认为“其定义并非根源自政治疆界位置,而是如何拥有正确的规模与范畴,以便在今日全球经济中成为一个真正且自然的企业单位”^[21]。当然,在民族国家是否迈向终点这一问题上仍旧争辩不休,但多数人或许都同意:国家或政府单位虽依旧是最重要的一体化来源,但自主性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对于传统国家主义的挑战,也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22]。

表 3 东南亚微地区主义发展概况

计划名称	推动起点	涵盖地缘范围
南部成长三角 (MS-GT)	1990年	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后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扩张至马来西亚南部4个州与印度尼西亚西部6个省
湄公河开发计划 (GMS)	1992年	包括流域所涵盖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与越南地区,1995年东盟峰会也提出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计划
黄金四角	1993年	湄公河上游包括中国、老挝、缅甸与泰国合作计划
西部成长三角 (MT-GT)	1993年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马来西亚的吉打、玻璃市、槟榔屿与霹雳州,泰国北部的北大年、沙敦、宋卡和也拉等府
东部经济成长区 (EAGA)	1994年	包括苏禄海外围的文莱,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巴拉望,马来西亚的沙巴与沙劳越,印度尼西亚的北苏拉威西与加里曼丹
孟中印缅合作区	1999年	包括四国比邻的边界地区
马泰联合发展区	1999年	由马来西亚将沿岸生产的天然气运往泰国南部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相较于国家在全球化与地区化运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微地区运动主要归功于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国际组织;即便有国内力量介入,但至少未必由中央政府,而是由地方来推动^[23]。从某个角度来看,微地区主义其实是一种透过比较利益法则,让虽具地缘邻接性,但未必拥有共同政治基础的区域,得以彼此合作以便提升其在全球竞争力的手段。“加工出口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的设置是个明显例证,它意味着国家让其一部分地区加入国际劳务分工的行列,也暗示着这些区域将因其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而有与国内其它区域逐渐隔离甚至割裂的倾向^[24]。至于其更具体作为是“成长三角”(growth triangle)^[25],这是一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区概念。1989年,新加坡向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议,希望能通过垂直分工结构,利用后两者的廉价土地与劳力以建立互利共生的发展网络。这一计划的实施使柔佛州成为马来西亚工业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印度尼西亚巴丹岛获得大量外资,新加坡也藉此更上一层楼^[26]。就在三国共组“南部成长三角”的同时,马来西亚也在1990年将同样模式推销给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希望一起组成“西部成长三角”,针对旅游、投资贸易、农渔业、服务业、基础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项目进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由于组成西部三角各国缺乏明显分工结构,一体化成果也相对有限,菲律宾仍在1992年提出建立“东部经济成长区”构想,然后在1994年签署合作计划,成立东部东盟商务理事会作为协调机构。但是,它所遭遇的问题显然跟西部三角颇为类似,因此很难发挥有效的乘数效果。

相较于前述地缘经济区的发展,湄公河开发则是另一种类型。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早在1955年便提出一个共同开发水资源的“湄公计划”,并在1957年成立湄公河委员会,但因此区域长期陷于战乱,该委员会工作也限于进行相关研究,1992年才重新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 (GMS) 计划, 由中国、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与越南等共组部长级会议, 并在 2002 年举行合作计划首度峰会。迄今该计划已投入超过 20 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亚洲开发银行便占了 10 亿美元, 至于航运与铁路公路网等建设则是重点所在。值得注意的是, 除由亚行推动的大湄公河计划外, 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又在 1995 年签署《湄公河流域永续发展合作计划》以推动水资源开发管理 (中国与缅甸在 1996 年成为其对话伙伴); 1996 年东盟 7 国也邀集中国、缅甸、老挝与柬埔寨等共同通过《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基本框架协议》希望强化东盟与此流域国家的合作^[27]。除此之外, 泰国在 1993 年提出所谓“黄金四角经济计划”, 邀请中国、缅甸和老挝以禁毒为前提, 在湄公河上游的大金三角地区推动替代性种植, 并共同在该地区发展交通与旅游事业。

最后,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于 1999 年召开“中孟印缅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 会后发表《昆明倡议》希望提升四国边界合作。其后在 2002 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中决定更名为“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 以逐步朝建制化发展迈进。由于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与尼泊尔等国都有希望加入论坛的意愿, 所以该论坛不仅正由“第二轨道”朝“第一轨道”机制发展, 未来也可能由微区域机制升格为次区域机制, 甚至成为东南亚以及南亚这两个次区域之间的连接点。

四 地区主义层次: 大东亚体系的建构

地区主义传统上被认为是指由邻近国家间进行的“国家间合作关系”, 建立地区组织则可能来自某个领导国家的野心所致。这种政治解释今天已不再适用于所有情况, 因为地区主义更可能来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缘化压力, 这也正是新地区主义的主要观点。例如马特尼 (Walter Mattli) 便强调商

业领袖在推动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性^[28]; 索德邦 (Fredrik Soderbaum) 也指出, 新地区主义的特征在于其多面性、复杂性、流动性与非一致性, 亦即不仅涵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 并同时以正式与非正式形态表现出来^[29]。至于多数学者也将地区主义发展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 首先是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 因为世界大战引爆民族主义浪潮所衍生出来的“第一波地区主义”, 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止;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迄今则出现了“第二波地区主义”, 也就是前述的新地区主义。至于区域贸易协议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的缔结则不啻是新地区主义在推动一体化时的主要结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东亚部分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创造了快速发展的经济成就, 但在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却似乎相对沉默^[30]。东盟在 1977 年缔结的优惠贸易协议象征在次地区一体化方面的首度突破。由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欧洲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 再加上 20 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奇迹发展, 东亚地区内部看来似乎长期存在着高度的经济联系与互相依赖性。在这个基础上, 自冷战迄今, 东亚确实也陆续出现不少地区一体化构想, 但正如表 4 所示, 其中多数仅存在于研究或口头倡议, 具有可运作性者并不多, 主要理由乃因区域外强权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亦即由于美国企图阻止任何单一国家崛起, 或抵制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一体化倡议, 以便保护其战略与经济利益, 导致东亚一体化迟迟未能出现^[31]。当然, 除东亚经济仍未达稳定发展程度外, 进一步“共识”的不存在或许也是应当注意的。不仅“新亚洲主义” (Neo-Asianism)、 “太平洋路线” (Pacific Way) 与“亚洲观点” (Asian View) 等众说纷纭, 美国、日本与若干主要亚洲国家对未来一体化架构的想法也不尽一致; 换句话说, 由于无法解决认同问题以便凝聚必要共识, 因而深化或提高互动层次也成为一项障碍。

表 4 东亚地区主义相关倡议与发展

年份	倡议者	主张内容
1961	联合国	提出“亚洲经济合作组织” (OAE) 倡议
1965	日本	提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PFTA) 倡议
1967	澳、新西兰、日	倡议并成立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 (PBEC)
1975	美国总统福特	提出“新太平洋主义” (NeoPacifism) 倡议

(续上表)

年份	倡议者	主张内容
1977	日本首相福田纠夫	提出“太平洋主义”(Pacifism)倡议
1979	美国参议院	提出“关于建立亚太地区经济组织研究报告”
1980	日本	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报告书与“环太平洋经济圈”倡议
1980	美、澳、日	倡议并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
1981	东盟	提出《东盟与太平洋共同体研究报告》
1988	日本	提出“东亚经济环”(EAER)倡议
1989	美国	提出“太平洋经济共同体”(PEC)倡议
1989	澳、新西兰、日	倡议并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1990	马来西亚	提出“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
1991	马来西亚	将“东亚经济集团”改称“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
1991	美国总统布什	提出“太平洋共同体”(PC)倡议
1993	美国总统克林顿	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NPC)倡议
1997	日本财相宫泽喜一	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倡议
1998	东盟	开始召开“东盟加三”(APT)非正式峰会
2001	东亚展望小组	提出“东亚共同体”(EAC)倡议
2001	菲、澳、日、中	倡议并成立“博鳌亚洲论坛”(BFA)
2002	东亚展望小组	提出“东亚自贸区”、“东亚投资区”与“东亚峰会”倡议
2003	日本、东盟	签署《东京宣言》,确定迈向“东亚共同体”目标
2004	中国、东盟	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协议》
2004	东盟加三	建议并决定于2005年召开首届“东亚峰会”
2005	十加六	召开首届“东亚峰会”
2005	马来西亚	提出“亚盟”(AU)倡议
2006	日本	提出“十六国亚洲自由贸易区”倡议
2006	美国	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与亚太公约”倡议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无论如何,1989年的APEC机制乃东亚地区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初期成就包括在1991年《汉城宣言》中确立“开放、平等与演进”原则,在1992年《曼谷宣言》中确立制度深化目标,在1993年《西雅图宣言》中提出建立经济共同体愿景,在1994年《茂物宣言》中宣告在2020年完成全面贸易自由化,在1996年《马尼拉宣言》中宣布将于2000年取消或降低信息产品关税等。受这些影响,马来西亚也在20世纪90年提出“东亚经济集团”倡议^[32],但因此建议明显具有排除美国的潜在企图,而引发后者的反弹^[33],加上马来西亚在东亚拥有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所以此建议最后无疾而终。总的来说,相较于欧洲与美洲发

展迅速的地区主义运动,东亚迄今可说既缺乏明确的共识与目标,而APEC似乎也难成为未来主导一体化的推手。尽管东盟乃目前发展较成熟的次地区建制,但在谋求从“次地区”升格到“地区”的过程中,或许“权力”因素要比“共识”重要得多,而这并非普遍缺乏国际影响力的东盟所能提供的。进言之,就算东南亚国家可藉既存的东盟参与未来的一体化,但主导东亚主义发展的恐怕还是东北亚的日本、中国或韩国。例如金大中在2000年的“十加三”峰会中便提出建构“东亚共同体”的主张,随后并由“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2001年报告中建议列为东亚一体化目标。2002年,东亚展望小组进一步在“十加三”峰会中建议成

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投资区与东亚峰会，日本也在2003年的“十加一（日本）”峰会中，与东盟共同声明致力于擘建共同体。

尽管如此，相较于地区主义发展最后层次之共同体建构，中国与东盟在2004年底所签署包括《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与《中国与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内的《自由贸易协议》则是东亚地区主义展的第二个转折点。据此，双方将在2010年前废除区域内所有关税限制，并谋求全面合作机会，未来将拥有20亿人口与2.4兆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估计是全球最大经济区，按经济规模估计则仅次于北美与欧洲。

五 结论

从前述讨论可以发现，东南亚正处在地区主义、次地区主义与微地区主义等三种一体化途径交织而成的网络中，每种途径也都有自己设定的动力来源与发展目标。例如，地区主义试图通过超国家互动来建构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规模，次地区主义希望在提升竞争力与维系国家认同间寻找平衡点，至于微地区主义则不啻是一种“向下发展”的超国家互动，目的在重新找回地缘环境与人类活动间的正常关系，然后依循古典经济法则来建构理性的国际分工。无论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非正式性、共识导向与开放式地区主义乃是当前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三个特征^[34]；非正式性是指一种将合作障碍极小化的设计^[35]，例如“东盟模式”与亚太经济合作推动的非正式谈判，强调“不反对”而非“全体一致”的东盟模式也说明了追求共识而非全体一致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至于所谓开放式

地区主义更是东亚有异于西欧或北美的一体化方式^[36]，目的是为了吸纳更多具异质性成员。

当然，东亚一体化所具备的开放特征并非一成不变的^[37]。其原因是，东亚过去所以采取开放性地区主义途径乃由于其所拥有的特殊时间（美苏对抗与冷战爆发）、地理环境（位居冷战围堵圈前线）、发展条件（多数国家处于从殖民地解放独立初期发展阶段）与成员性质（异质性强）等因素所致，一旦这些情况有所改变，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奇迹”的出现，正如前面表4中所列述的，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起，无论是东亚经济集团、东盟加N高峰会、东亚共同体倡议，或各国间一连串的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都可明显看出区域自主性上升与开放性退却的迹象。

至于在未来发展方面，首先从短期发展来看，尽管缺乏具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但因ASEAN仍是东亚或东南亚地区发展较成熟的多边机制，因此，包括东盟机制、东盟峰会与东盟区域论坛等，仍将是最重要的政策沟通管道，甚至从目前情势看来，它还有机会扮演“议题设定者”的关键角色。其次从中期发展来看，包括次区域与微区域途径在内的复杂一体化网络，一方面既可能提供更弹性的决策空间，但超国家平台与非政府网络的活跃，也可能影响甚至重塑东南亚地区的认同基础，从而带来某种政治效应。最后在长期展望方面，如果全球化浪潮与全球区域化运动的趋势继续下去，而东北亚大国也终于能够达成权力平衡共识的话，东南亚销融于更宏观的一体化浪潮中，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注 释】

[1]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0, pp. 6-7.

[2] Karl W. Deutsch. "On Nationalism, World Regions and the Nature of the West", In Per Torsvik ed., *Mobilization,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s and Nation-Building: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an*, Berger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1, pp. 51-93.

[3]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cago: Rand & McNally Company, 1967, p. 11.

[4] Peter Robso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5.

[5] Bjø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elsinki: UNU World, 1994, p. 4.

[6] Chia Show Yue and Lee Taso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 New Motive Force in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in C. Fred Bergsten and Marcus Nolan eds.,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7] Thanet Myo and Min Tang eds., *Growth Triangle Theory to Practice*,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6.

[8] W. C. Neale,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1, No. 3, 1987, pp. 1177-1206.

[9] S. Bulm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EU: A New In-

stitu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4, 1994, pp. 351–380. V. Lowndes “Varietie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 Critical Apprais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74, No. 2, 1996, pp. 181–197.

[10] G. Marks “An Actor-centred Approach to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C. Jeffery, ed.,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Frank Cass, 1997, p. 34.

[11] Norman Palmer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Pacific*,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1, p. 5.

[12] Glenn Hook and Ian Keams eds., *Sub-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 6.

[13] Robert Garnaut “ASEAN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4, No. 3, 1998, pp. 10–15.

[14] M. Pangestu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s Going Forward the ASEAN Way”, in H. Soesastro, ed., *ASEAN in a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akarta: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 49.

[15]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2004, pp. 68–69.

[16] Kusuma Snitwongs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hanging Southeast Asia”, in Robert Scalapino and Sung-Joo Han, eds., *Regional Dynamics: Secur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Jakarta: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0, pp. 40–41; She-Hon Simon, “The Regionalization of Defense in Southeast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5, No. 2, 1992, p. 122.

[17] Biveer Singh, *ZOPFAN and the New Security Order in Asia-Pacific*,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1, p. 98.

[18] Amitav Acharya “Realism,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sia Economic Crisi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1, No. 1, 1999, p. 19.

[19] John Garofano “Power, Institutions,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sian Survey*, Vol 13, No. 3, 2002, pp. 502–521.

[20] Olivier Kransch and Barbara Hooper, eds.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1] Kenichi Ohmura,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5, p. 6.

[22] Tim Shaw, “New Regionalisms in Africa in the New Millenniu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p. 399–414.

[23] Chia Siow Yue and Lee Tsao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 New Motive Force in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in Fred Bergstein and Marcus Noland, eds., *Pacific Dy-*

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p. 236.

[24] Mit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e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7, No. 2, 1995, pp. 171–209.

[25] Than Myo Min Tang and Hiroshi Kakazu, eds., *Growth Triangles in Asia: A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47.

[27] Mya Than and Carolyn L. Gates *ASEAN Enlargement: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p. 142.

[28]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9] Fredrik So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2.

[30] Joshua Kuratzick, “Is East Asia Integrat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 4, 2001, p. 21.

[31] Ted G. Carpenter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8, p. 294.

[32] Susumu Awanohara, ed., *Japan's Economic Role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sponses*, Hong Kong: Center for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1990, pp. 24–25.

[33] Mark T. Berger “APEC and Its Enemies: the Failure of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p. 1013–1030.

[34] Etel Solingen, “East Asian Regional Institutions: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s, and Distinctiveness”, in T. J. Pempel, ed., *Rethink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38.

[35] 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2, 1991, pp. 495–538.

[36] Rose Gamaut *Open Regionalism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6.

[37] Richard A. Higgo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Salience of Region Building”, in Kris Oks et al.,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Contested Terri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91–106.

【责任编辑: 邓仕超】